

“银河，你好哇。世俗所谓必不可少的东西我是一件也不要的。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你和我说话像对自己说话一样，我和你说话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

“小波。我的活力不够，这一点从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的生命的活力在吸引我，我不由自主地要到你那儿去，因为你那里有生活，有创造，有不竭的火，有不尽的源泉。”

“爱到深处真美。”

“爱上你灵魂的那一刻，我也接受了你的容颜。”

李菁

1977年，李银河大学毕业，在《光明日报》史学组当编辑。一天，她在朋友处读到了王小波的手抄本小说《绿毛水怪》，里面描述了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恋情，其中的“真”深深打动了她。小说作者的名字自然而然地刻在了她的心里。她暗自思忖，是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充满诗意的小说啊！

第一次见到王小波，她失望至极，他长得真够难看的。小波却对银河心生爱意。不久之后，他去光明日报社给银河还书。他问她，“你有男朋友吗？”银河摇头。“你看我怎么样？”小波的爱



王小波李银河：  
爱上你的丑

像冬日里挂在树梢的冰棱，赤裸裸毫不掩饰，却又如此纯净，让人无法拒绝。

刚开始恋爱就遭遇挫折。银

河提出了分手，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他长得太难看了。小波气坏了，在信中说：“你从这信纸上一定能闻到二锅头、五粮液、竹叶青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

特立独行的王小波不仅才华横溢，在生活中也时时透露出热忱与幽默，于他来说，有趣比什么都重要。

信的末尾有一句话把银河逗乐了，他说：“你也不是就那么好看呀。”

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因为容貌嫌弃过对方，反而是那异于常人的精神内核将他们彼此深深吸引，再也分不开了。

张伯驹讥讽袁世凯

张伯驹的嗣父张镇芳和袁世凯是同乡，又因为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二哥，两人结下了姻亲之谊，所以，张伯驹早年对袁世凯印象不错。

1915年春节前夕，张镇芳命张伯驹去北京给袁世凯拜年，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召见这位世侄。袁世凯发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面庞英俊、风度翩翩，不禁暗自高兴，心里有意将其留在身边。于是，袁世凯不露声色地问张伯驹“愿不愿意到府里(指总统府)当差”。张伯驹回答，自己正在袁世凯麾下的陆军模范团见习。袁世凯爽快地说：“好好学习，毕业了，就到我这里来。”

可是，张伯驹在军阀部队里目睹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趋炎附势、装腔作势，内心十分反感。对他思想触动最深的，莫过于袁世凯称帝的卑劣和虚伪。

1915年初，全国各地反对

帝制的呼声越来越高。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害怕夜长梦多，父亲称帝不成，自己“皇太子”的美梦也随之破灭。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反对袁世凯称帝。袁克定心生一计，每期另造一份，称日本如何赞成帝制。

有一天，袁世凯的三女儿上街给父亲买花生米，包花生米的纸恰是《顺天时报》。袁世凯看到，才恍然大悟，此前所阅的报纸都是伪造的。他当即派人把袁克定叫来。袁克定见事已败露，忙跪下求饶。袁世凯气愤至极，命按家规大棒伺候。但袁克定已被封为“皇储”，何人敢打？只好装模作样，比划几下了事。张伯驹闻讯，嗤之以鼻，赋诗讥之：“群言举世已滔滔，假印刊章孰捉刀？袁氏家规怨大过，一场戏演打龙袍。”

据人民政协网

总理巧评梁祝

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在见面会上放映我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作为时任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接到指示后，心里暗暗打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的越剧，老外们怎么能看懂呢？熊向晖绞尽脑汁，连夜写了一份长达15页纸的影评，从背景、意义、演员阵容、对话台词等方面都用英文做了详细的说明，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一眼厚厚的影评，皱了皱眉头说：“向晖啊，我们这是给老外看，你这内容虽然很详细，但他们不懂我们的文化，不一定看得懂啊。”无计可施的熊向晖摇了摇头说：“总理，那您说该怎么写这份影评呢？毕竟文化差异太大了。”周总理凝神沉思了一会说：“只要给这部电影取个恰如其分又特别有吸引力的名字就好了，你只需在请柬上写‘请欣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就行了，其余不必做过多解释。”

最后，按照周总理的建议，电影如期放映，观看电影的各国与会代表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特别是著名幽默大师卓别林看后，竟被影片的精彩情节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电影能取得巨大成功，不得不归功于周恩来的那句简短评价。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周恩来没有进行冗长的描述，他只是找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共同点进行了一个巧妙的结合，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清晰而完整地展现在老外面前。其实，在生活中也是如此，话不在多，关键是找到共鸣。



袁雪芬(左)饰祝英台，范瑞娟(右)饰梁山伯，1953年剧照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写到当年他在给《新青年》撰稿时，一次翻译了一篇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标题为《小的一个人》。对于这个小说的中文译名，周作人不甚满意，但无论如何总是译不好，最后无可奈何，就这样交给了编辑部。

那一期《新青年》的轮值主编是陶孟和，他提笔添了一个字，变成了《小小一个人》。一下子从别扭、拗口，变得活了起来，既通顺流畅，又很贴切。60年以后，周作人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他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至今不能忘记，

周作人的“一字”缘

真可以说是‘一字师’了。”

除了这“一字师”外，周作人还与另外两个字有缘。其胞兄鲁迅给了他一个字的评价“昏”。纵观周作人的一生，与长兄决裂，小昏；投身事敌，大昏。一个“昏”字，不失公允，又入木三分，是再准确不过。鲁迅的一字评价，可謂是“知人论事之言，料事如神之笔。”

上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教授温源宁在讲到周作人时，用了一个字“冷”。的确如此，当抗战

爆发后，周作人以“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要靠我养活”为借口拒不南迁，特别是他说“鲁迅的母亲”，正反映了他——对母亲的冷，而他最终成了民族的罪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俗话说：“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纵观周作人的一生，尽管文学成就很高，但其人品却多为人不齿，这的确让人为之惋惜；而这一“昏”，一“冷”，可谓是对其一生产了最好的注脚。

据《羊城晚报》

卢承庆宠辱不惊

唐朝大臣卢承庆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很小就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由于他为官清正，很受李世民的信任，被任命为吏部考功员外郎。考功员外郎主要负责对官吏们进行考评，虽然算不上位高权重，但考评关系到每位官员的仕途升迁，这个职位也算举足轻重的了。卢承庆上任后，一直兢兢业业，公正、负责地对待考评官吏之事。有一年，一位管理漕运的官员在督运粮草时遇上大风，导致运粮的船只沉没了。

年度考核中，在给那位运粮官评定等级时，卢承庆给了他一个“监运损粮，考中下”的评语。那位官员听完后，神色自若，一言不发地退了下去。卢承庆对这位官员的气度颇为欣赏，转而一想：粮船沉没也不全是他的责任，碰上这样的事情，只怕回天乏力啊，若评为“中下”，恐怕不合适。于是，卢承庆把那位官员叫了回来，对他说：“损失粮草非人力所能及，考中中。”随之把评语改了过来。那位官员听卢承庆这样评价自己，只是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不置可否。卢承庆非常钦佩他的涵养，不禁脱口而出：“好，宠辱不惊，难得难得！”当即又把对他的评语改为：“宠辱不惊，考中上。”

据《广州日报》

张达明

暮年的周有光教授仍坚持工作。

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教授一生经历坎坷。由于长期、大量的脑力劳动，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的痛苦一直折磨着他。“文革”爆发后，他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这样的境遇，对别人来讲是场灾难，他却当成了治疗失眠症的好机会。劳动中，他抢着干重活、累活，几年下来，不仅治好了失眠顽症，身体也比以前强壮了许多。

谈到干校那段经历，周有光格外感恩：“这是因为上帝和我的私交很好，他老人家知道我失眠，就特意安排我去那个地方治疗，结果，还真管用了呢。现在看来，与

周有光与上帝的『私交』

上帝有私交还真沾大光呢。”

对于死亡这个敏感话题，周有光从不忌讳：“佛教上说，一个人活到90岁后死去，叫做‘圆寂’，中国人活到100岁才算功德圆满。我现在已活过了100岁，这说明我不仅功超了圆，德也溢了出来，但这又有什么呢？我终究不还是要死的吗？”

每当有人向周有光讨教长寿的秘诀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我哪有什么秘诀呀，无非是与上帝有那么一点私交，也许他老人家利用职权刻意给安排的吧。”



宋美龄：“永不卸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这样说宋美龄：“一位乱世美人，以女性非凡的情感，影响了大千世界。”每一个接触过宋美龄的人都会用“精致”来形容她，精致的容装，精致的衣着，所以有了精致的人生。宋美龄一生恪守的信条是“永不卸妆”。据说连蒋介石都没有见过她的素颜。

美国将军史迪威写到：“在开罗会议期间，宋美龄穿着一件绣着金色菊花的紧身黑缎旗袍。她尽力以她那优雅举止和旗袍开叉处一闪一闪地露出的匀称的腿来吸引与会者的注意力。”在宋美龄一生中，凡大型国际舞台与会议，她精致的衣着与装束，每每都成为她取得焦点的杀手锏。连蒋介石都感叹：“夫人的力量，抵得过二十个陆军师。”

据全球通史

曾国藩调教女婿

曾国藩的长女曾纪静，嫁的是曾国藩翰林院同事、好友袁芳瑛的儿子袁榆生。袁榆生六七岁时，长得虎头虎脑，聪明伶俐。所以曾国藩在大女儿才六岁的时候，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孰料世事常不如人愿。袁漱六长于藏书，却短于教子，对儿子过于娇纵。袁榆生长大之后，“不喜故书雅记”，一味“豪迈善博饮”，不服管教。等到袁芳瑛去世后，他更如同脱缰的野马。曾国藩得知后，决定把他接到

身边，亲自管教。他相信自己宽严相济、以身作则、耳濡目染的教育方式，能让这个女婿有所进步。

一开始，曾国藩认为袁榆生的最大问题不过是不愿读书。就给他找来经验丰富又有耐心的老师，希望能诱起他对书本的兴趣。孰料这个从小在书堆中长大的书痴之子，却很逆反，在书房里怎么也坐不住，对文字硬是亲近不起来。不久之后，曾国藩就失去了信心。

实在不愿读书，曾国藩也不再勉强，毕竟曾国藩是一个讲究

“经世致用”的人，一贯开明，他认为并非只有书本上记载的才叫知识，如果愿意去读世事这本大书，能经办具体事务，也能体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既然袁榆生生性外向，曾国藩就把他安排到徐州粮台，让他经营湘军粮饷，以锻炼办事才能。

然而，袁榆生到了徐州不久，就大肆招嫖，而且还仗着总督女婿的身份横行霸道，欺压平民。曾国藩是一个讲“礼学”的人，“刑不上大夫”，他没有直接处理自己的女婿，只是严厉责打了女婿的家丁，还把妓女抓了起

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当天“竟夕为之不怡”。一直讲究家风的曾家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曾国藩怎么能不愤懑至极。但袁榆生非但没有悔过，还觉得岳父让自己丢了脸，于当日夜晚吞服鸦片自尽，“其毒甚重，指甲已青”，好在最终被抢救过来，没闹出人命。这件事轰动内外，尽人皆知。曾国藩的幕友莫友芝在当天日记当中记载说：“昨日相公命捉其子倩袁公子所狎妓及其徒者二人，痛鞭之，袁公子遂吞鸦片，垂毙，救且活矣。”

据《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